

文化出版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古文 學 典

十編第9冊

國族與歷史的隱喻—— 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 (1895~1949)

高嘉謙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 編

曾 永 義 主 編

第 9 冊

國族與歷史的隱喻

——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

高 嘉 謙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
～1949）／高嘉謙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4〔民103〕

目 2+17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編：第9冊）

ISBN 978-986-322-910-0（精裝）

1.俠義小說 2.武俠小說 3.文學評論

820.8

103014146

ISBN-978-986-322-910-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編 第九冊

ISBN：978-986-322-910-0

國族與歷史的隱喻

——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

作 者 高嘉謙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年9月

定 價 十編 18冊（精裝）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國族與歷史的隱喻
——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

高嘉謙 著

作者簡介

高嘉謙，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文學、臺灣文學、馬華文學。著有博士論文《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主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上海：上海文藝，2012）、馬華文學的日本翻譯計畫「臺灣熱帶文學」系列（京都：人文書院，2010-2011）。

提 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清末民初俠義公案與武俠小說興起及演變過程中的內在敘事理路，及其隱含的國族與歷史的寫作企圖。全文共由六章組成，分做兩階段的處理，處理的對象則是橫跨1895～1949年間的重要武俠文本。緒論部分除了針對論文架構與理論的說明，另也描述出一個武俠熱的知識場景，探討攸關武俠消費與經典化歷程的文化、文學建制與中國性議題。第二章以「現代性與雅俗流變」為題，簡單勾勒自晚清到五四的小說嬗變所凸顯的現代性問題，從而處理武俠敘事在「近代小說化」（novelization）進程中與民國的通俗小說體系所呈現的被壓抑現代性，辯證性的呈現武俠小說的「現代」意義。第三章的論述以「武俠」為對象，在精神史的框架下檢視一個生成於近代中國的消費話語，試圖為其建構歷史與文化的語境，以文化符碼形構的歷程及身體中介個體與國體的國族想像帶出一個「武俠」實踐的知識準備和武裝形式。對於小說雅俗辯證與「武俠」文化歷史的處理，基本可視為第一階段的論述。第二階段的論述開展，就直接針對俠義公案及武俠小說進行文本化的個案分析。

第四章從晚清俠義公案的「武俠化」進程，藉由「武」和「俠」兩個關鍵元素的分析引導出詭譎的正義結構的辯證，探討其中招安、俠隱與革命的內在轉折。第五章則鎖定民國武俠傳奇的「寓言化」現象，討論武俠小說紀實與虛構的敘事策略，進而選擇身體、成長、和江湖三個主題面向進行寓言化的解讀，以期在武俠文本內建的社會與歷史空間中捕捉豐富的現代意義與消費趣味。身體作為武俠小說中膨脹與壯碩的主體，卻投映了近代中國隱然可見的歇斯底里式的身體與身體法制化的進程。成長所意味的俠客闖蕩江湖的磨難與轉變，則縮影了從晚清留美幼童到民國革命青年的「少年中國」藍圖。而江湖呈現為武俠傳奇時空體的魅力所在，更在地理空間與文化時間的操作上寄託民間廣場與烏托邦想像的實踐，以揭示一個「文化中國」的美學品味和意義。最後一章的總論與展望，則以金庸的集大成回應武俠的敘事傳統與消費魅力，及總結本論文未能處理的課題，以作為下一次論述的起點與展望。

自序

高嘉謙

這是 2001 年底完成的碩士論文，距今已有十三年之久。雖然目前的學術研究重心已不在近代小說，但武俠仍是個人的學術關懷。無論教學或購書，總是會接觸相關研究。這些年學術界仍舊熱衷討論類型小說，其中武俠小說的新作者也並不少見，其中不乏創新者和暢銷作品，顯然武俠還是不退燒的議題。

當年以晚清—民國的武俠小說為對象，討論的基礎是從敘事類型和精神史脈絡，試圖勾勒和描述武俠類型的近代起源。因此從「傳奇」(romance) 的敘事類型討論武俠內部的敘事元素，以及文本特質，希望藉此突出研究武俠應該觸及的批評概念。附錄的兩篇論文寫於 2002-2003 年間，已是博士班初期，屬武俠議題的系列研究，藉此出版機會一併收入。這是我對武俠的階段性思考，希望可以提供不同的學術討論。

碩論的出版，畢竟帶有紀念當年初涉學術的熱情與衝動。礙於教學與學術工作的繁忙，本書除了部分字句的修辭改動，並未做大幅度的內容修訂。部分新的武俠研究趨勢和成果，只能以註解補充，但已無法一一回應。書裡若有不夠成熟和完善的論點，代表了彼時的學術能力和眼光。這是學術訓練養成的必經階段，紀錄當年自己的青澀與抱負。

最後，感謝當年引領我走向學術思考的指導老師黃錦樹教授。多年來亦師亦友的提攜與照顧，感念在心。其時的兩位口考委員，王德威教授和張大春先生，給了我不同的學術／文學啟發。尤其王德威教授，在我後續的學術生涯更扮演了關鍵角色。這本碩論也紀錄了歷經九二一地震、北上臺大寄讀，避居淡水寫作的歲月。當年碩論完成後沒寫序，現在藉此書，紀念當年一起

奮鬥的暨大同窗，雖然大家最終走向不同的路。當然，更要感謝這麼多年一直鼓勵和陪伴在側，當年的女友，現在的妻。

2014年7月6日林口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武俠熱的知識場景	1
第二節 國族寓言與武俠傳奇	8
第三節 研究框架與章節安排	12
第二章 現代性與雅俗流變	17
第一節 從晚清到五四的小說嬗變	17
第二節 被壓抑的現代性：民國通俗小說體系	23
第三章 武俠：近代中國的精神史側面	29
第一節 一個文化符碼的形構	29
第二節 魂與中國武士道	36
第三節 俠與中國身體	40
第四節 武俠傳奇：魂在與賦形	49
第四章 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武俠化」進程	53
第一節 一個臥虎藏龍的起點	53
第二節 喧囂的美學	62
第三節 詭譎的正義：招安、俠隱與革命	72
第四節 江湖的修辭性建構與開展	80
第五章 民國武俠傳奇的「寓言化」現象	83
第一節 紀實與虛構之間	83
第二節 身體：內在時鐘與外在戒律	90
第三節 成長：神秘奇遇與少年中國	99
第四節 江湖：魔法時空與文化中國	111
第六章 總論與展望	121
第一節 金庸與中國文化的重建	122
第二節 偉大傳統的延續：說書人	124
第三節 新的視野與可能	126
引用、參考書目	129
附錄一 回歸江湖：《城邦暴力團》的「歷史」經驗與技藝	145
附錄二 暴力的視窗：論革命與武俠的現代性隱喻	15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武俠熱的知識場景

一、文化中國與中國性

武俠小說作為傳奇（romance）類型的發展歷程自晚清以降已有一世紀之久。儘管流行於明清的俠義公案小說與民國以後才大興的武俠小說有著類型上的本質差異，但兩者的敘事體質卻不出浪漫故事的框架，並且還是一個古典寫作傳統「說部」的延續。武俠類型的確立在晚清之際實有一個俠義公案的過渡階段，五十年代以後以金庸為代表的新派武俠的成熟卻也有大量民國武俠小說醞釀試驗的基礎。這百年來武俠小說的發展象徵了文學史上通俗文學範疇龐大的資本累積，同時也見證了通俗小說敘事姿態的轉折，一個漸趨文人化與典雅化的取向。對於五四新文學傳統而言，武俠小說在多種通俗文學類型的整合基礎上確實以新的資源進駐到正宗的文學主流，干擾著書寫的行進。多年來被主流文學史排除在外的武俠小說，卻也因為豐厚的作品積累開始動搖五四範式下的文學史論述。各種近現代通俗文學史的寫作就是最好的例證。武俠不再是難登大雅之堂的小市民文藝，卻可能是將近百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歷程中最廣受歡迎的類型文學，尤其還可被視為五四以降「感時憂國」傳統之外的寓言寫作。武俠以傳奇文本及次文本的消費方式存在已成為值得重視的文學／文化現象。

放眼望去，大量武俠文本相應產生的廣大讀者群，在消費武俠的過程中

衍生了許多附屬的效應。武俠訴諸娛樂層面，則以量產的電影電視形式將其推向另一巔峰，甚至發展至當代各種電動、電腦、線上遊戲的生產，皆意味了武俠的消費行為經由聲光媒體的中介，已從單純的文學類型上綱為一種文化形式。這種類型文化透過共享的文化經驗帶出了「凝視」的介入姿態，一種對時空體的確切把握和無限想像，成功導引精神復歸的旅程。絕對的封閉時空，相應的古典意象，超自然的物質建構，形成的一種凝視姿態彷彿帶有一股魔力，對於當中刀光劍影、恩怨情仇的母題理解不只是消費性的想像式快感，而是一個文化場景的召喚。聲光化的武俠使得感覺形式具象化，並與武俠文本產生內在的共鳴，因為二者同處於編碼空間。虛擬界面操作的魔法張力釋放的想像力量使消費者「信以為真」的直接進入感覺，在堆積的材料上建構普遍性記憶，所有的刺激、想像、審美見證了被置入其中的咒語般的召喚。這意味著武俠在純粹感官娛樂之外有其獨特的敘事結構。這形塑於近代中國情境，運作古老俠之精神的文類，除卻明顯的文化商品性格，仍有其獨立的思考邏輯，表現方式和精神體質。武俠所代表的文化消費無異是一種心靈經驗的參於，一種腔調、姿態和表情的綜合諧仿與投入。這樣的文化商品習性宣稱了其獨有的品味，以及被豐富解讀的可能。這也就不難理解，當武俠在泛文化面的廣為消費，並形成歷久不衰的熱潮的同時，另一知識性的運作也在進行。簡單來說，知識性的運作也代表著經典化的過程。從文學史寫作的立場而言，相對弱勢的武俠屬通俗範疇，卻也進入經院化，成為通識課程，說明了文學傳統範式的轉移，武俠文學得以登堂入室在文學史佔據位置。

然而，雅俗之間複雜的互動、滲透和位移，不但是文學場域內的資本結構問題，更是一個文化建構的過程。武俠作為九十年代以來雅俗共賞的文化類型，極有力的說明了中文知識界一個文化狀態的轉型和運作的痕跡。將武俠議題擺在國學熱這樣一個龐大的文化個案之旁，主要是藉由國學熱的文化生態揭示武俠精神內在的文化體質，同時也透過武俠的生生不息反映百年來一個不斷在消費的文化經驗。國學與武俠鮮明的雅俗對立，其實在文化接受過程中發生了微妙的結構性轉變。國學熱在九十年代的流行包裝對照武俠知識性運作的「經典化」歷程，除了代表著文化結構性的調整，不也暗示著一個徘徊不去的文化情境。當國學跨出幽暗的象牙塔，而武俠得以進入象牙塔一窺堂奧，兩者交錯的背影卻浮現出一個異常清晰的文化幽靈。國學的復興意味著回到了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神單位，透過歷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連接，

在學術建制之餘明顯深化了民族主義的情緒〔註1〕。國學熱的大眾消費，伴隨陳寅恪、王國維、吳宓、錢鍾書、顧准、錢穆等等代表性人物的系列論述、傳記、日記的學術生產，卻是象徵了精神家園、文化尊嚴，甚至中國性的確立與堅守。儘管各方對國學熱現象有諸多不同的見解，但國學熱本身的重要框架卻是近代中國精神的體現〔註2〕。至於登上學術舞台的武俠文學，整體的精神魄力卻是呼應著知識分子的內在渴望，壯碩的中國體質。對應於國學回歸到學術尋找精神單位，武俠在雅俗層面成功開啓一個想像民族的全景。武俠「在本質上內含了時間的中國性」進而遍佈的「中國細節」所彰顯的文化效應，甚至可以輕易跟新儒家提出的「文化中國」藍圖接軌〔註3〕。武俠代表的必然古裝、必然中國，說明了其歷久不衰的在華人世界廣泛消費的根本原因。一個潛在中國性的被需求、被審美及被記憶〔註4〕。中國性雖為一巨型結構〔註5〕，但落實於庶民階層的消費卻往往需要儀式性的步驟，叩關密語以催化一種文化回憶，甚至普遍性的追憶。這樣的特質置於海外華人的脈絡來看卻再明顯不過〔註6〕。武俠文化作為另一個類型個案，透過俠者譜系的傳承及

〔註1〕 相對國學大師們的正統與正當性，一個極有趣的個案是既非國學大師也非碩儒文人的文化雅痞辜鴻銘。近幾年辜鴻銘以《中國人的精神》在彼岸狂銷，一個在清末民初的文化守成者竟捲入了二十世紀末狂歡化的民族主義街頭運動。其搖擺辮子的身影，仿如空閒迷向的老頑童，不時露出不合時宜的詭笑。

〔註2〕 關於九十年代彼岸國學熱的討論文章甚多，有的視其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復興，有的則認為是「文化英雄」符號的展現。但國學熱的內在架構始終不出一個近代的文化情境。甚至籠統的說，當代中國瀟灑的民族主義情緒仍是晚清以降歷經百年的精神症狀。

〔註3〕 黃錦樹，〈不想金庸——文化代現的雅俗、時間與地理〉，收入王秋桂主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社，1999年），頁587~607。

〔註4〕 舞龍舞獅、揮寫春聯、燈籠、華樂、古裝電影電視劇等等都是「中國性」的中介。一個有趣的現實參照個案是馬來西亞的電視台早期所引進的港台連續劇中就是以不符國家民情而拒絕古裝劇。直到風靡華人世界的《包青天》的引進，還一波三折的經由當地華人政黨領袖在國會請願，才透過首相馬哈迪宣佈批准播出，從此打破這一道沒有明文規定的禁令。對於視中國性為禁忌的大馬政府而言，古裝劇所意味的召喚「中國」的鮮明種族色彩自然不言而喻。

〔註5〕 中國性的本質、內涵和定義恐怕會是一個涉及面非常廣的複雜問題。相關論述可參黃錦樹，〈魂在：論中國性的近代起源，其單位、結構及（非）存在論特徵〉，《中外文學》，（第29卷·第2期），2000年7月，頁47~68。

〔註6〕 黃錦樹教授針對馬來西亞華人的個案處理指出了中國性的世俗消費總帶有表演性的儀式步驟。參黃錦樹，〈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收入氏著，《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出版社，1998年）頁93~161。

「百科全書式」的「偽知識」的文化資料庫的建構，屬於身體與精神面向的投入往往是在體會一種虛擬的「中國經驗」。從兩岸三地對武俠小說與電影電視的集體抄襲、複製及量產的現象來看，武俠作為另類時間文化載體所設置的回歸路標恰恰引導著讀者以文字聲光的形式介入其中，不厭其煩地經驗文化美感與身體意象進而深入到一種無意識的文化記憶場景。因而武俠所內含的中國，又或古典之所以被一再強調，當然並非僅以「偽身體」取代現代世界的槍炮彈藥。身體的聖化以光暈的形式呈現，牽引了中國性的意圖進駐，才是整個文類必然歸返的旅程。除了時間、中國細節鮮明的標誌，一個敘事幽靈的出沒，使得武俠傳奇回到了典型的中國書寫氛圍：抒情傳統。除了浪漫的想像，典雅的氣派、內斂的情感，寶劍秘笈只是懷舊物，通向文化的消費。

二、文化與文學建制

武俠文學的知識性運作最顯著的例子自然是以新派武俠大師金庸的經典化歷程為標誌〔註7〕。這當中除了三場分別在美國哥倫比亞、台北及北京舉辦的「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為整個武俠文學正典化的巔峰，其實早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學就主辦了一場「國際中國武俠小說研討會」掀開武俠小說經院化的序幕。之後台灣淡江大學先後兩場的「俠與中國文化」、「縱橫武林」的武俠文學研討會以及淡江大學中文系專闢「武俠小說研究室」收集武俠文學資料更進一步替武俠文學進行學科建制。武俠小說進入學科研究的範疇，除了有學者專家以學術專著的方式投入研究（以中國大陸的陳平原教授、徐斯年教授和台灣的龔鵬程教授、林保淳教授、葉洪生先生的研究成果較有代表性），當然也漸次進入學術生產機制。中國大陸和台灣同時於1998年產生了以金庸武俠小說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註8〕，就有其完整的學科建制的

〔註7〕 有關金庸的經典化歷程及其引發的爭議和筆戰，可以參考吳曉黎，〈90年代文化中的金庸——對金庸小說經典化與流行的考察〉，收入戴錦華主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30～162；廖可斌編，《金庸小說論爭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

〔註8〕 中國大陸方面是宋偉傑的博士論文《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衝動：金庸小說再解讀》（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所），台灣則有羅賢淑的博士論文《金庸武俠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這自然是以民國與新派武俠小說的研究為判準。明清與古代俠義小說基本已是學科建制的古典小說研究。

指標性意義。武俠小說的經院化自然帶動了出版效應。除了武俠小說的重新整理出版，相關的武俠評論、隨筆等等良莠不齊的雜論式著作也大量進入書坊〔註9〕。這些武俠文本以外的知識性運作顯示了大量對武俠文學的參與和接受抬高了武俠作為普遍消費的類型文化。武俠的被借用或移花接木諸如「股市的天龍八部」、「武俠星座人生」等等不就彰顯了武俠所引發的普遍共鳴衍生的抄襲、複製與氾濫的社會現象。

其實有關武俠進入學科建制的背景，一個不能被忽略的關鍵性因素是 80 年代以來的文學史書寫運動。這運動的顯著特徵就如陳平原所言是「晚清記憶」和「通俗小說」的被引進，以重構完整的現代文學場景。除了被壓抑的復返，這文學版圖的重整，還是企圖捕捉一個延綿不斷、生生不息的經驗書寫，那是相對五四正統，卻銘刻於群體經驗的消費話語。武俠自五四傳統的被切除，從「文學場」的被邊緣化，代表著普遍失落的文化記憶和虛構的想像性記憶。武俠的被整理和書寫，不過由世俗性消費進入知識性消費〔註10〕。整個武俠類型機制的技術性處理和確立，恐怕才是武俠正典化有價值且迫不及待的出路。

武俠熱的另一波動作則是武俠小說的重寫。自金庸以後很難再被超越的武俠類型使得這重寫的動作往往帶有顛覆、調侃、戲仿的趣味。嚴肅文學作家投入傳統通俗類型的創作，意味著一種文人化傾向的發展。早在 1989 年黃凡、林耀德主編的《新世代小說大系》就編有「武俠卷」收錄張大春、陳雨航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不論是「後設」武俠或「文學化」武俠，都有著實驗性的價值意義。大陸先鋒作家余華的〈鮮血梅花〉則是極端顛覆武俠小說敘事部件功能的反武俠小說。當復仇、寶劍、漂泊成了尷尬的組合，劍客跟武俠傳統脫落，將武俠主題推向哲思性與美學性的理解，武俠意圖歸返的古

〔註9〕 中國大陸對於武俠小說的出版、評論尤其顯著。除了對新派武俠的金庸有系列出版，早在 1996 年還出版了 46 冊的還珠樓主小說全集，2000 年配合電影《臥虎藏龍》也出版了王度廬小說全集。其中陳墨、韓雲波、徐斯年、曹正文等人的武俠評論、武俠史整理更多不勝舉。至於香港、台灣除了《諸子百家看金庸》系列的評論專著，就只有偶見葉洪生、林保淳等人的專書與討論。而台灣在武俠小說出版方面，除了 1984 年出版了「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之後，就只有新派武俠小說的出版。至到電影《臥虎藏龍》在奧斯卡得獎之後，才陸續重新出版王度廬、平江不肖生等舊派武俠小說。

〔註10〕 武俠進入知識性運作的詳細現象與事件，及其引發的衝擊與雅俗思辨已有許多論述。故本文不再贅言。代表性的討論可參考宋偉傑，《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衝：金庸小說再解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88~207。

典世界反而在重寫的動作中越趨文人化，進而遁入寓言化的敘事。爾後台灣的張大春與張北海的擬武俠小說《城邦暴力團》和《俠隱》同時將俠客拋入槍砲彈藥的時代，分別處理一個「逃亡」和「隱遁」的主題，整體的敘事姿態事實上回到了張恨水的「現實主義的武俠觀」。一種捨棄奇幻事物卻又承擔歷史記憶的江湖寫作。然而，不再遵從武俠小說成規的寫作本身已將敘事帶離到極爲「文人化」的操作，這一波「改寫」或「重寫」武俠小說是另一個爲「武俠」命名的歷程。武俠類型的傳統「商業」習性在相對嚴肅的寫作過程中恐怕必然削弱且進入知識化的運作層次。

繼余華等嚴肅作家的武俠創作後，聯合報在 2001 年推出的大眾小說文學獎就以武俠小說爲主題，敞開一個全民「武俠」的寫作風潮。武俠納入文學獎的體制運作，固然有著回歸正宗「純」文學生產機制的意味，但也不妨視其爲一個類型文學開啓新契機的可能。畢竟自金庸等新派武俠名家以後，武俠傳奇的敘事程式已漸露疲態且難有創新。故而，武俠小說的文學獎意義，既是提拔新秀卻也在試煉武俠類型的生機。但一個不過度依賴程式而力求創意的類型文學寫作，可以預見的趨勢反倒是文人雅化的必然。正當武俠投入文學獎的運作之際，聯合報配合武俠熱潮而推動蘇小歡的武俠小說《天地無聲》的連載，卻顯然已非當年武俠小說生成的商業動機。環境丕變，而閱讀趣味不改，武俠重寫的動作能將歷經百年的類型文學帶往何處，只能拭目以待。〔註 11〕

三、《臥虎藏龍》現象的意義延伸

導演李安在 2000 年結合好萊塢資金技術拍攝的武俠電影《臥虎藏龍》在成功打入西方市場，獲得多項奧斯卡獎項之後，確實達到了武俠電影發展 80

〔註 11〕 2005 年明日工作室主辦「第一屆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賞」開啓了另一波重寫武俠小說的熱潮，至今已進入第九屆，誕生了新一代的武俠小說作者。但這些得獎作品基本未引起更大的市場迴響。倒是 2007 年鄭丰以「2006 全球華文新武俠小說大賽」首獎作品《天觀雙俠》登陸文壇，獲得市場好評，陸續寫了四部作品，有「女版金庸」之稱。香港部分則有喬靖夫 2008 開始陸續出版的《武道狂之詩》，截至 2013 年已出版了 13 冊，以鋪陳武功技擊和武俠知識典故的寫法暢銷市場。大陸則以徐皓峰 2006 年出版形意拳師口述歷史的《逝去的武林》開始，寫作《道士下山》（2007）等硬派武俠作品，成爲新一代受矚目的武俠小說家。多部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其中參與了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2013）的編劇。

餘年來的巔峰。《臥虎藏龍》的成功把武俠的視野拉回到了新舊武俠過渡期的王度廬。這是將武俠的主題回歸到相對新派武俠繁雜的主題的一個純粹的起點〔註 12〕，同時又是總結晚清以降武俠類型潛在的主題矛盾。相對於過去幾年港台大量的武俠電影、電視劇的製作，這些粗製濫造的武俠文藝肥皂劇雖改編自金庸、古龍、梁羽生等名家名著，卻始終不曾引起廣泛的討論。倒是報紙和網路的叫罵顯得異常熱鬧。《臥虎藏龍》的成功恰是抑制住了武俠電影粗製濫造的趨勢，也重啓了另一波的武俠熱潮。這一股熱潮顯而易見的是武俠又回到了學者專家的知識性討論。相關略具深度的分析討論〔註 13〕，其實暗示了武俠類型新的可能。當李安捨棄新派武俠作品中已被大量複製且成標誌的角色，選擇《臥虎藏龍》以回到新舊武俠過渡期的王度廬，其實也就回過頭去正視自晚清以降的武俠基礎母題——廟堂與江湖的對話。這在新派武俠幾乎將二者完全對立的處理或不處理，江湖逕自遁入修辭性的操作。在武俠消費氾濫的今日看來，《臥虎藏龍》回到典雅、內斂的文人化敘事模式，回到王度廬在舊派與新派交接的關鍵過渡，其實為武俠類型從娛樂及想像過剩的局面拉回到人文思考。為一個五四以降的個人主義在武俠形式中尋得另類的成長模式。同時，對大部分的武俠消費群而言，恰恰是離開他們所熟悉的譜系，重新開始一個全新的譜系。奇遇從李慕白的青冥劍失竊開始，個人主義並非現成，卻是玉嬌龍不斷衝撞體制的結果。誠如作家楊照所言：「讀《臥虎藏龍》就是讀玉嬌龍可以任性到什麼地步。」〔註 14〕不是英雄的塑造，卻是一個經由武俠包裝的個體成長之旅。電影《臥虎藏龍》可以在西方受到熱

〔註 12〕 相對香港導演徐克以《蝶變》、《東方不敗》標榜的「江湖敘事」、王家衛以《東邪西毒》營造的江湖美學，甚至民族主義式消費的「黃飛鴻系列」，都有著繁複的正反江湖操作或歷史題材與民族英雄的寄託。相關研究可參考陳清僑，〈幾齣當代香港武俠電影中的希望喻象及江湖想像〉，收入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年），頁 281~308。楊明昱，〈黃飛鴻師父出招：電影武術英雄的表演與觀看〉，收入劉現成編，《拾掇散落的光影：華語電影的歷史、作者與文化再現》，（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1年6月初版），頁 115~129。

〔註 13〕 李欣倫記錄，〈武俠世界的嚮往與追尋：李安電影《臥虎藏龍》座談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0年7月18、19日）。曾昭旭，〈憑誰問玉梳化遊龍：試解李安的《臥虎藏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0年8月13日）。張小虹，〈江湖潛意識：《臥虎藏龍》中的青春欽羨與戀童壓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0年8月20日）。

〔註 14〕 楊照，〈復活了的《臥虎藏龍》〉，《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1年5月8日）。

烈的歡迎，西方觀眾所能消費的除了美麗的武打動作與異國情調，其實就是屬於俠客，也屬於個人主義的魅力。只是很弔詭的，透過通俗的武俠卻是在消費一個五四人文價值。從《臥虎藏龍》的回歸，我們可以發現武俠所處理的情境其實非常「現代」。

至於《臥虎藏龍》對武俠發展的意義而言，能不能也算是「重寫」武俠的一環，一個高度人文氣質與感性的表述模式？這樣的聯想並不離題。畢竟，《臥虎藏龍》對於一個由五湖四海組成的江湖的具像化〔註 15〕，以及剛柔並濟的武打設計，確實對疲憊的武俠電影類型而言展現了新的可能。隨著《臥虎藏龍》的走紅連帶的消費熱潮也反應在電視劇和廣播劇的推出。其中的人文內涵是否也隨著消費的蔓延而深入改變閱讀的口味，恐怕也只能靜待日後的發展。〔註 16〕

第二節 國族寓言與武俠傳奇

從武俠在近代中國生成的脈絡來看，一個以身體意象、奇幻體系、中國地理文化時空體建構的烏托邦想像，其實已脫離五四典範下的現代中國文學寫作而趨近於傳統說部的延續。然而，這個章回體的擬說部文類除了有著傳統說部的殘存形式，卻又在精神及用語上跟五四範式有著一定程度的對話關係。相對其就古典世界的堅持，或是超現實境域的經營，這封閉的時間與空間更像在虛構的寓言世界裡傳達一個俠義的故事。關於武俠小說歷來的批評觀念，不論神怪傳統、言情敘事、歷史演義、諷刺譴責都似乎可以在武俠小說找到各自的單位，展開批評的運作。但武俠本身其實更趨近於一個西方文

〔註 15〕 影視武俠的江湖表現，從來都是統一的標準語。但《臥虎藏龍》卻以李慕白的港式國語、俞秀蓮的南洋華語、羅小虎的台灣國語及玉嬌龍的京片子搭起了有著五湖四海味道的江湖，並由李、俞不靈光的國語吐出文謏諳的對白，整個片子的調性就是標準文人化的敘事。

〔註 16〕 《臥虎藏龍》之後的武俠電影發展有另一番的蓬勃景象，武俠元素的遊移與其他元素的進駐，改變了武俠電影的形式。除了重演民族英雄的《霍元甲》（2006）、《葉問》（2006）系列，其他以古代宮廷歷史、政治鬥爭、情愛恩怨為基調的武俠類型（《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滿城盡是黃金甲》（2006）、《夜宴》（2006）等），都有炫麗的武打動作和場面，鋪張的武俠元素同時混雜了其他元素。另外，以推理、辦案風格混入奇幻元素的武俠類型，就有徐克《通天神探狄仁傑》（2010）、陳可辛《武俠》（2011）、《劍雨》（2010）、《四大名捕》（2011）等。配合著電影 3D 技術的成熟和風行，影視武俠的類型變化值得觀察和另文處理。

類「傳奇」(romance)的批評概念。套用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對弗萊(Northrop Frye)的傳奇理論的簡要勾勒：

傳奇是一種願望滿足和烏托邦幻想，旨在改變日常生活世界，以便恢復某個失去的伊甸園的狀況，或期待一個從中將消除舊的死難和缺憾的未來王國。因此，傳奇不包含以某種理想的王國來替代普通的現實……而是包含一個改變普通現實的過程。〔註17〕

在詹明信的脈絡下，傳奇是一種經由想像實體賦予文本意義的方式，而意義的本身既可以是一種「本質」、「精神」和「世界觀」。以這樣的解讀回頭檢視武俠文類，武俠敘事的基本特質總是一個冒險的「追尋」，在一個正邪對立的歷程中完成一個本質的揭示。在武俠的情節推演中，那往往會是一個大俠的成長，稱霸武林的慾望實現，或是無止盡的浪遊。單就傳奇文類需要具備的寓言元素而言，武俠小說佈滿的奇幻物像，文化細節已是一個隨時可以啟動寓言敘事的元素表。但武俠小說真正的內在精神消費，卻是一個「傳奇」性質的展現。歷來論述武俠江湖世界的觀點，當然不會錯過烏托邦的想像。但武俠的烏托邦卻不盡然是現成的替換，而是冒險過程的界面，經由俠者個體的冒險衝突，江湖因而發生意義，一個俠者的歸宿與意識的浪遊處。換言之，武俠的文類批評概念在貼近於「傳奇」之際，卻透顯出武俠本身可以是寓意的寄託。武俠敘事當中所意圖呈現的世界觀或精神，恰恰是斷裂的主體經驗的追尋與懷舊。在武俠世界封閉的時空體中，擬古典世界的堅持彷彿是有著盧卡奇意味的「總體性」的復歸，在這樣的世界裡見證「無家可歸」的個體透過成長的經驗去重建完整的世界。少俠的浪遊江湖、拜師學藝、鋤奸除惡、稱霸武林，縮影了少年中國的時代文學形象。而「中國」在此已是有著審美意義的烏托邦。

事實上，「傳奇」作為近現代武俠的類型概念，重要的著眼點應在於武俠的烏托邦特質呈現。這裡的烏托邦定義，自然不是「純粹」的超越世俗的異域。若仔細對照近代武俠生成的時代脈絡，武俠傳奇內含的烏托邦性質確實與現代性發生著重要的關聯。這當中有著與現實政治錯綜複雜的關係。於是，寫作或烏托邦寫作倒成了值得探究的脈絡。其視野恐怕不只是侷限在武

〔註17〕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中國大陸也譯作詹姆遜。本論文為求譯名統一，故內文所用皆以詹明信為準。引文見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97。